呼吁

隐形委员会

目录

命题一 4

注释 5

命题二 10

注释 11

命题三 16

注释 17

命题四 22

注释 23

命题五 28

注释 29

命题六 34

注释 **35**

命题七 **40**

注释 **41**

命题一

文明的胜利不缺少任何东西。既没有政治恐怖，也没有情感贫困。也没有普遍的不育症。

沙漠不能再扩大：它无处不在。但它仍然可以加深。

面对显而易见的灾难，有的人愤慨，有的人注意，有的人谴责，有的人被组织起来。我们站在那些被组织起来的人一边。

注释

这是一个呼吁。这就是说，它的目标是那些能听到它的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证明、争论、说服。我们将直接讨论已经很明显的东西。这主要不是一个逻辑或推理的问题。明显的东西是可感知的东西，是现实的领域。

每一个现实都有一个明确性。什么是共同拥有的，或者什么使事物与众不同。在这之后，交流再次成为可能，交流不再是预设的，而是要建立的。

而这个构成我们的明显事物的网络，我们被教导得很好，去怀疑它，去避免它，去隐藏它，去把它留给自己。我们被教导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当我们想喊叫的时候却没有话说。

至于我们所处的秩序，每个人都知道它包括什么：帝国正盯着我们的脸。一个垂死的社会体系除了其荒谬的决心–其衰老的决心–仅仅是徘徊不前之外，没有其他的理由来证明其任意性；全球和国家警察已经得到了自由的手，可以摆脱那些不听话的人；文明，在其心脏上受伤，在它所开始的无休止的战争中，不再遇到任何东西，只有它自己的极限。这场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逃亡，只产生了一系列越来越频繁的灾难；大量的人类通过谎言、愤世嫉俗、残暴化或药片来适应这种事物的秩序–没有人可以再声称忽视这些事情了。

而那种无休止地描述当前灾难的运动，带有不同程度的抱怨，只是另一种说法。” 事情就是这样的”；臭名昭著的奖品是记者，是所有那些每天早上假装重新发现他们前一天才注意到的废话的人。

但就目前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帝国的傲慢，而是反击的软弱。就像一个巨大的瘫痪。一种大规模的瘫痪，它有时会使人们说什么也做不了，但在被逼到极限时，他们有时会承认” 有很多事情要做”–这并没有什么不同。然后，在这种瘫痪的边缘，是活动家们的” 我们真的要做一些事情，任何事情”。

西雅图、布拉格、热那亚、反对转基因生物的斗争、失业者的运动；我们在最近几年的斗争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我们站在了一边；当然也不是来自 Attac 的议会外（目前）左派联盟或 Tute Bianche 的黑色反全球化激进分子。

抗议的民间传说已经不再让我们感到好笑。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沉闷独白从高中生的口中被反刍出来。我们看到最纯粹的无治主义否定了它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们看到最乏味的经济主义–我们在《外交世界》的朋友的经济主义–成为新的流行宗教。而否定主义宣称自己是全球左翼知识分子溃败的唯一选择。

各地的激进主义都回到了提高其摇摇欲坠的建筑，其令人沮丧的网络，直到它被耗尽。

警察、工会和其他非正式的官僚机构花了不超过三年的时间，就把短命的反全球化运动瓦解了。为了控制它。把它分成独立的” 斗争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它是无用的。在这个时代，从达沃斯到阿雷格里港，从法国的老板工会 Medef 到西班牙的 CNT，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都指向同一个缺失的视野。同样的截然不同的管理灾难的前景。

与这种主导性的荒凉相对立的，不过是另一种荒凉，只是没有那么好的库存。到处都有相同的愚蠢的幸福观念。同样的痉挛的权力游戏。同样是被化解的肤浅性。同样的情感文盲。同样的沙漠。

我们说，这个时代是一片沙漠，而且这片沙漠在不断地加深。这不是诗意的手段；它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明显性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特别是与所有抗议者、所有谴责者和所有对灾难喋喋不休的人的断裂。

谴责的人把自己排除在外。

一切看起来就像左派在积累造反的理由，就像经理人在积累统治的手段一样。也就是以同样的喜悦。

沙漠是世界上逐渐减少的人口。我们所采取的生活习惯，仿佛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沙漠存在于持续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人口无产阶级化中，就像在加利福尼亚的郊区一样，那里的痛苦恰恰在于似乎没有人经历过它。

目前的沙漠没有被察觉，只是验证了它的存在。

有些人试图为沙漠命名。指出必须与之斗争的东西–不是作为某些外国代理人的行动，而是作为一种关系的组合。他们谈到了奇观，谈到了生物权力，谈到了帝国。但这只是增加了当前的混乱。

奇观并不是大众传媒的简单缩写。它同样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虚假形象被无休止地扔回给我们的残酷之中。

生物权力不是社会保障、福利国家或制药业的同义词；但它愉快地栖息在我们对自己漂亮身体的照顾中，栖息在与自己和他人的某种身体疏离中。

帝国不是某种地外实体，不是政府、金融网络、技术官僚和跨国公司的世界性阴谋。帝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事情发生。在任何地方，事情都在运作。到处都是现状的统治。

我们继续把敌人看成是一个面对我们的主体–而不是把它体验为一种约束我们的关系–我们把自己局限在反对禁锢的斗争中。我们在替代方案的借口下重现最糟糕的统治关系。我们建立了出售反对商品的斗争的商店。我们看到反权威斗争的当局的崛起，大男子主义的女权主义，以及反法西斯分子的种族主义攻击。

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参与一种情况。在一个情境中，没有主体和客体，没有我和他人，没有我的欲望和现实–只有关系的合奏，有穿越它的流动的合奏。

有一个总体背景–资本主义、文明、帝国，如你所愿–这个总体背景不仅打算控制每一种情况，而且更糟糕的是，寻求一种方法，尽可能经常地确保没有情况。他们规划了街道和住宅、语言和情感，甚至驱动所有这些的全球节奏，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任何地方，不同的领域都是相互滑动的，被忽视的。正常的情况是没有情况。

组织起来意味着：摆脱这种情况，而不仅仅是挑战它。要在其中站稳脚跟。织造必要的物质、情感和政治团结。这就是任何办公室、任何工厂的罢工所做的事情。这也是任何帮派所做的。任何地下组织；任何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政党。组织起来意味着：给形势以实质内容。让它变得真实，有形。

现实不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在一个局势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需要成为盟友，并为此建立一些沟通渠道，一些更广泛的潮流或趋势。反过来，这些新的联系又重新配置了局势。我们把我们所陷入的局面称为全球内战。在那里，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对立力量之间的对抗。甚至法律也不行，它作为普遍的对抗的另一种形式而发挥作用。

在这里说话的” 我们” 不是一个可定义的、孤立的” 我们”，不是一个群体的” 我们”。它是一种立场的我们。这个立场目前被断言为双重分离：首先是从资本主义价值化的过程中分离，然后从单纯反对帝国（议会外或其他）所强加的所有不育中分离；因此是从左派中分离。在这里，分离的意思与其说是实际拒绝交流，不如说是对交流形式的倾向性，以至于在付诸实践时，它们从敌人那里夺走了大部分的力量。简而言之，这种立场从” 黑豹” 那里借来了突然的力量，从德国自民党那里借来了集体食堂，从英国新卢德派那里借来了树屋和破坏的艺术，从激进女权主义者那里借来了精心选择的词语，从意大利自民党那里借来了大规模的自我削减，从六 · 二运动那里借来了武装的欢乐。

对我们来说，不再有任何不具政治性的友谊了。

命题二

控制的无限升级是对系统的可预见的崩溃的无望回应。在已知的政治身份分布中所表现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导致超越灾难。

因此，我们从退出它们开始。我们不争论任何东西，我们不要求任何东西。我们把自己作为一种力量，作为一种物质力量，作为全球内战中的一种自主物质力量。

这一呼吁为其奠定了基础。

注释

在法国，一种新的驱散人群的武器，一种木质破片手榴弹正在测试中。在俄勒冈州，有人提议对阻挡交通的示威者判处 25 年监禁。以色列军队正在成为城市安抚方面最突出的顾问；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急于对消灭颠覆分子的方法的最新发现表示惊叹，这些方法既可怕又微妙。看来，伤人的艺术–伤一吓百–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当然，还有被称为恐怖主义的东西。那就是，” 个人或团体对一个或多个国家、其机构或其人口故意犯下的任何罪行，目的是威胁和/或严重破坏或摧毁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 这就是欧盟委员会的定义。在美国，囚犯比农民多。

随着它的重组和逐步夺回，公共空间被摄像机所覆盖。这不仅是因为监视现在是可能的，而且是变得特别容易接受。各种各样的嫌疑人名单在各部门之间流传，我们几乎看不出他们可能的用途。在警察的保护下，准军事团体取代了曾经由八卦和告密者，即另一个时代的人物担任的职位。中情局的一位前局长在《世界报》上写道，他是那些站在对立面的人中的一员，他们变得有组织而不是愤慨。他在《世界报》上写道：” 这不仅仅是一场反恐战争，更重要的是将民主扩展到威胁自由文明的 [阿拉伯和穆斯林] 世界，我们在整个 20 世纪，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随后的冷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建设和捍卫自由文明而努力。”

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到震惊；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措手不及，也没有什么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我们出生在灾难之中，我们已经与它建立了一种奇怪而舒适的习惯关系。几乎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从我们有记忆以来，除了全球内战的消息，就没有其他的消息。我们被培养成幸存者，成为生存的机器。我们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生命就是不断地继续下去；冷漠地行走，直到被其他行走相同的身体压垮，他们跌跌撞撞，反过来被压垮。最后，这个时代唯一的新意是，这一切都不能再隐瞒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知道它。因此，这个系统最近出现了明显的硬化：它的动机已经暴露，希望它们消失是毫无意义的。

许多人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左翼或极左翼的部分，没有一个已知的政治力量能够反对这一事件的发展。” 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对吗？” 他们可以想很久：在传统政治框架内表达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限制沙漠的前进，因为传统政治是沙漠的一部分。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为了鼓吹议会外政治作为自由民主的解药。几年前由法国所有社会正义团体和社会运动签署的流行宣言” 我们是左派”，充分表达了三十年来推动议会外政治的逻辑：我们不想夺取权力，推翻国家，等等；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被承认为有效的代表。

凡是古典政治观念盛行的地方，同样的无能就会在灾难的对面盛行。这种无能广泛分布在各种最终可以调和的身份之间，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无治主义者联合会的无治主义者、议会的共产主义者、Attac 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立法者都是从同样的截肢开始的；他们传播着同样的沙漠。

对他们来说，政治就是在人与人之间解决、说、做和决定的事情。将他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的集会，将所有人类从他们各自的领域中抽象出来的集会，形成了理想的政治局面。经济，经济领域，顺理成章：它既是对所有留在集会之外的东西的必要管理，也是对所有被确定为非政治的东西

的不可能的管理，这些东西后来成为家庭、商业、私人生活、休闲、娱乐、文化等等。

这就是政治的经典定义是如何传播沙漠的：通过将人类从他们的世界中抽象出来，通过将他们与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感知世界的事物、习惯、词语、癖好、情感、地点、团结的网络断开联系，并赋予他们特定的内容。

古典政治是没有剧院的身体的光荣的舞台。但是，政治个体的戏剧性集会可怜地掩盖了它的沙漠。不存在与人类和非人类的总和相分离的人类社会。这里有多种多样的境界。这些领域因为是共享的，所以更加真实。而且它们是共存的。

事实上，政治是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那些兼容的领域之间的联盟和那些不可调和的领域之间的对立。

因此我们说，过去三十年的核心政治事实没有被注意到。因为它发生在如此深刻的现实层面上，如果不对政治的概念进行革命，它就不能被称为政治。因为这个现实层面也是在被视为现实的东西和非现实的东西之间进行划分的地方。这一核心事实是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现在，每个人都被认为是自然的，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这一理念的基础上，与世界建立起了一种和谐关系。这样的生活由一系列的选择组成，无论好坏。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品质和属性来定义自己，这些品质和属性通过她对这些属性的不断平衡，使她成为一个独特和不可替代的存在。契约充分体现了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尊重是所有美德的缩影。语言只不过是达成协议的一种手段。在现实中，世界一方面是由需要管理的事物组成，另一方面是由自我陶醉的个人组成的海洋，而这些人又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倾向，把自己变成事物，让自己成为被管理的对象。

当然，愤世嫉俗只是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无限的临床诊断的可能特征之一。它还包括抑郁症、冷漠、免疫缺陷（每个免疫系统在本质上都是集体的）、不诚实、司法骚扰、长期不满、被拒绝的感情、孤立、对公民身份的幻想，以及失去所有的慷慨。

存在主义的自由主义把它的沙漠宣传得很好，甚至最真诚的左派也用它的术语来表达他们的乌托邦。” 我们将重建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贡献，每个人都从中得到自己的需求满足…..。就个人欲望而言，如果每个人的消费与她准备贡献的努力成正比，那就可以是平等主义。自然，有必要重新定义评估每个人所付出的努力的方法。” 反对埃维昂八国集团峰会的另类、反资本主义和反战村的组织者在一篇题为《当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被废除时!》的文章中写道。这里是帝国胜利的关键：设法保持在阴影中，用沉默包围它所操纵的地形，它在上面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操纵感情，定义可感知的界限。通过这种方式，它在行动的那一刻就预防性地瘫痪了任何防御，并破坏了反攻的想法。每当激进分子在结束了一天艰苦的政治工作后，在一部动作电影前颓然倒下时，胜利就会到来。

当他们看到我们从古典政治的痛苦仪式中退出–大会、会议、谈判、抗议、要求–当他们听到我们谈论可感知的领域而不是工作、身份证、养老金或行动自由时，激进分子会给我们一个怜悯的眼神。” 可怜的家伙，” 他们似乎在说，” 他们向少数人的政治屈服了，他们退缩到他们的贫民窟，放弃了任何斗争的扩大。他们永远不会成为运动的一部分”。但我们认为恰恰相反：是他们通过说他们的虚假的客观性语言，使自己屈从于少数人的政治，其严重性只包括重复和修辞。没有人被他们谈论人民的忧虑时掩饰的蔑视所愚弄，这种蔑视使他们可以从失业者到非法移民，从罢工

者到妓女，而不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他们的蔑视就是这么明显。他们扩大斗争的意愿不过是为了逃离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人，尤其是逃离那些他们害怕的人。最后，正是他们不愿意承认敏感的政治意义，不得不依靠感性作为他们可怜的动力。总而言之，我们宁愿从小而密集的核心开始，也不愿从庞大而松散的网络开始。我们对这种没有骨气的做法已经足够熟悉。

命题三

那些会用反应的紧迫性来应对形势的紧迫性的人，只会让人更加窒息。

他们的干预方式，他们的鼓动，指向他们政治的其余部分。

至于我们，形势的紧迫性使我们从所有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考虑中解放出来，这些考虑在任何情况下都已经变得不适合居住。

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建立一个全面胜利的革命运动，这并没有使我们退缩。我们平静地思考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平静地承认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行为的犯罪性质一样。

注释

我们已经知道，而且仍然熟悉，积极主义的诱惑。

反和运动、反对驱逐、反对新的安全法和建造新的监狱的运动、占领、无边界营地；所有这些的游行活动。逐步分散的集体对同样分散的活动作出反应。在运动之后奔跑。

在一个特定的基础上感受到我们的力量，但代价是每次都会回到一个基本的无力感。为每次运动付出高昂的代价。让它耗尽我们所有的能量。然后转到下一个运动，每一次都更加喘不过气来，更加疲惫，更加悲哀。

渐渐地，通过要求，通过谴责，我们变得无法感觉到什么应该是我们参与的基础，流经我们的紧迫性的本质。

激进主义是第一个条件反射。对当前形势的紧迫性的标准反应。以紧迫性为名的长期动员是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老板让我们习惯的，即使我们与他们斗争。

生命的形式每天都在消失；植物和动物物种，人类的经验和无数的生命体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的紧迫感与其说是与这些灭绝的速度有关，不如说是与它们的不可逆转性有关，更与我们无法重新填充沙漠有关。

活动家动员自己反对灾难。但只是为了延长它。她的匆忙吞噬了世界上仅存的一点东西。活动家对紧迫性的回答仍然忠实于紧迫性的制度，没有希望摆脱它或打断它。

活动家想去任何地方。她走到机器崩溃的节奏中去。每到一处，她都带着她务实的创造力，带着她反对灾难的节日能量。毫无疑问，这位活动家完成了任务。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投入到思考如何去做。如何具体地阻碍沙漠的进展，以建立无需等待的可居住的世界。

我们抛弃了行动主义。但不忘赋予它力量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的某种存在。在其中行动的便利性。一种理解斗争的方式；不是从道德或意识形态的角度，而是从技术和战术上。

旧的激进主义则提供了相反的例子。在各种情况下，激进分子的无知是令人惊讶的。我们记得热那亚的这一幕：托拉斯基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盟的大约 50 名激进分子挥舞着标有”100% 在左” 的红色旗帜。他们一动不动，永恒不变。他们喊着事先批准的口号，周围有和平警察。与此同时，在几米之外，我们中的一些人与卡宾枪手的队伍作战，扔回催泪弹，撕开铺路石做弹丸，用在垃圾中找到的瓶子和从翻倒的 Vespas 车上的汽油准备燃烧弹。当被迫对我们进行评论时，激进分子说的是冒险主义、无所谓。他们的借口是，条件不合适。我们说，什么都不缺，一切都在那里–除了他们。

我们在激进主义中抛弃的是这种不在状态。就像我们抛弃积极主义谴责他们的不一致一样。

活动家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种不一致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定期向他们的长辈，即激进分子求助。他们借用他们的策略、斗争的领域和口号。激进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是他们所缺乏的一致性、结构和忠诚度。因

此，活动家们又回到了新旧争议和要求–” 所有人的公民权”、” 人们的自由流动”、” 保证收入”、” 免费公共交通”。

要求的问题在于，通过用让权力听得见的术语来表述需求，它们对这些需求，以及它们需要对世界进行哪些真正的改造，什么也没说。因此，要求免费的公共交通并没有说明我们对旅行而不是被运输的需要，没有说明我们对缓慢的需要。此外，要求往往最终掩盖了真正的冲突。要求免费的公共交通只是减缓了逃票技术的传播，至少对这个特定的环境来说是这样。要求人们的自由流动只是意味着回避了实际逃避控制的问题。为有保障的收入而战，充其量是让我们自己陷入这样的幻觉：要想摆脱资本主义，就必须改善资本主义最坏的情况。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僵局总是一样的：调动的主观资源可能是革命性的，但它们仍然被嵌入到（激进的）改革主义的方案中。在克服改革和革命之间的选择的借口下，我们适时地陷入了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

目前的灾难是一个主动变得不适合居住的世界。在人类彼此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一切都被有条不紊地破坏了。如果没有权力技术，特别是政治技术，资本主义不可能战胜整个地球–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有或没有工具，肉体的或话语的，色情的或烹饪的，控制的纪律和机制，谴责技术的统治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技术首先包括打破依附关系，通过这种依附关系，一个群体在同一运动中找到了生产其生存和存在条件的手段。把人类群体与无数的东西分开–石头和金属、植物、有一千种用途的树木、神、精灵、野生或被驯服的动物、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护身符、机器，以及它们领域中与人类共存的所有其他生命。

破坏所有的社区，将群体与他们的生存手段和与他们相关的知识分开：这是政治理性，它决定了将商品作为每一种关系的中介。正如有必要清算女巫–也就是她们的医药知识以及她们所提倡的在有形和无形世界之

间的运动–今天，农民不得不放弃他们自己播种的能力，以维持跨国农业企业和其他农业政治组织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的这些政治技巧在当代大都市找到了它们的最大集中点。大都市正是这样一个舞台，在那里，最终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重新占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做的，人类只与自己有关，只与其他生命形式分开创造自己，撞上或利用它们，却从未见过它们。

在这种分离的基础上，为了使其持久，即使是最微小的、试探性的、在商品关系之外生活的尝试，也被定为犯罪。合法性领域长期以来一直与使生活不可能的多种约束混为一体–通过雇佣劳动或自营职业，慈善工作或好战主义。

在这个领域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的同时，一切能够有助于使现实生活成为可能的东西都被转化成了犯罪。

在活动家声称” 没有人是非法的” 的地方，我们必须认识到恰恰相反：今天，完全合法的存在将是一种完全顺从的存在。

我们有逃税、虚构就业、内幕交易、假破产、福利欺诈、挪用公款、造假和其他各种骗局。有在飞机行李舱中跨越国界的旅行，有在一个城市内或一个国家内无票的旅行。逃票和入店行窃是大都市中成千上万人的日常行为。还有一种非法交易种子的做法，保护了许多植物物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还有更多功能性的非法行为。有的被容忍，有的被鼓励，还有的最终会受到惩罚。荒地上的简易菜园，甚至在第一次收获之前就有可能被推土机推平。

如果我们把管理所有任何人在一天内可以穿越的空间的特别法律和习惯法规的总和加起来，没有任何一个生命可以保证不受惩罚。法律、法规和司法决定的存在，使每一个存在都会受到惩罚；这将仅仅是一个将它们应用于文字的问题。

我们不准备打赌，在沙漠生长的地方，也会生长出能够拯救我们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功，因为它不是通过与使这片沙漠生长的一切事物决裂而开始的。

我们知道，建立一个任何规模的力量都需要时间。有许多事情我们不再知道如何去做。事实上，我们这些受益于现代化和我们发达地区所提供的教育的人几乎不知道如何自己制造什么。甚至收集植物用于烹饪或制药–而不仅仅是用于装饰–在最好的情况下被认为是过时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被认为是一种好的爱好。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观察：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资源和知识，这些资源和知识是由生活在这些旧世界的土地上的简单事实所提供的，我们可以将它们交流。

问题不在于有钱还是没钱，不在于偷还是买，不在于工作还是不工作，而在于如何利用我们拥有的钱来增加我们对商品领域的自主权。如果我们宁愿偷窃而不是工作，或者为自己生产而不是偷窃，这并不是由于对纯洁的关注。这是因为伴随着商品流动的权力流动，即制约我们获得生存的主观服从，已经变得过于昂贵。

会有很多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设想：我们既不想离开去农村，也不想重新占有和积累古代知识。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方法的再利用。也不是对知识的重新占有。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知识、这些技术、以及在行动主义领域所展示的所有创造性都放在一起，我们仍然不会得到一场革命运动。这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一个创造条件使攻势能够持续而不消退的问题，一个建立使我们能够维持它的物质团结的问题。

我们相信，没有共同的物质力量的构成，就没有革命。我们并不忽视这种信念的时代性。我们知道这既太早又太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间。我们已经不再等待。

命题四

我们把逆转点、走出沙漠的途径、《资本论》的终结，放在每个人设法在她的想法和她的生活方式之间建立的联系的强度上。与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相反，我们拒绝将其视为一个私人问题，一个个人问题，一个性格问题。相反，我们的出发点是确信这种联系取决于共同领域的建设，取决于将有效的方法置于共同的领域。

注释

每一天，每个人都被责成接受这样的事实：询问思想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是幼稚的、过时的，是纯粹的、简单的文化缺失。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症状。这不过是自由主义对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别进行重新定义的结果，这种定义从根本上说是现代的。自由主义提出的原则是，一切都必须被容忍，一切都可以被思考，只要它被认为对当前的社会结构、机构和国家权力没有直接影响。任何思想都可以被接受；只要社会和国家规则被接受，其表达甚至应该被支持。换句话说，私人的思想自由必须是完全的，她的表达自由原则上也必须是完全的；但就涉及集体生活而言，她不能渴望她的思想的后果。

自由主义可能发明了个人，但它从一开始就发明了残缺不全的她。自由主义的个人，从来没有比今天的和平主义和民权运动更好地表达自己，她应该依附于她的自由，只要她的自由不对她做出任何承诺，当然也不会试图把自己强加给别人。今天，” 我的自由在别人的自由开始的地方结束” 这一愚蠢的戒律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即使是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尽管他是自由主义征服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也注意到了一个不幸的后果：一个人被允许渴望任何东西，唯一的条件是它不能过于强烈，它不能超越私人的界限，或者在任何情况下超越公共自由表达的界限。

我们所称的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是对一系列事实的坚持，这些事实的核心是显示出一种背叛的基本倾向。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一种低档位上运作，在这种低档位上，我们对背叛的想法感到释然。这种情感上的低档是我们接受的成为成人的保证。对于最热心的人来说，还有情感上的自我控制作为一种不可动摇的理想的幻觉。然而，对于那些决定遵守这些承诺的人来说，要背叛的东西太多了，这些承诺无疑是从童年就开始的，而且他们继续相信这些承诺。

在自由主义的信条中，表现得像一个主人，甚至对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不像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行为主要意味着不珍惜自己的财产。或者说，真的应该赋予” 财产” 另一种含义：不是属于我特别的东西，而是将我与世界联系起来的东西，因此不是为我保留的东西，与私有财产无关，也与应该定义身份的东西无关（” 我就是这样的”，及其确认” 这就像你！”）。虽然我们拒绝个人财产的想法，但我们并不反对承诺。挪用或再挪用的问题归结为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也就是说，就使用而言，就需要而言，就与一个地方、一个世界的时刻的关系而言，是适当的。

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是适合被视为政治理想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自发的伦理学。当你有能力放弃某种关系或斗争以保持你的地位时，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它不会总是没有痛苦，但这正是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的高效之处：它甚至为它产生的不适提供了补救措施。给国际特赦组织的支票、公平贸易咖啡、反对最后一场战争的演示、观看迈克尔-摩尔的最新电影，这些都是伪装成将拯救你的姿态的非行为。完全照常进行；也就是说，在指定的地方散步，做你的购物，和往常一样。但除此之外，还要让你的良心得到安慰；购买无标识产品，抵制壳牌公司。这应该足以让你相信，政治行动，从根本上说，不需要太多，而且你也有能力参与其中。

在这种购买和销售的放纵中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问题在普遍的混乱中变得很明显。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呼唤文化” 使人们在消费礼仪之外几乎没有谈论道德的余地。环保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团结协会的数量增加，恰好引导了普遍的不满情绪，从而促进了这种状态的持续，通过个人的价值、官方的认可和诚实的补贴的一等奖；简而言之，对社会有用性的崇拜。最重要的是，不再有敌人。最多就是问题，被视为灾难的滥用–只有权力的机制才能保护我们免受危险。

如果说自由主义创始人的执着是对教派的中和，那是因为他们联合了所有的主观因素，这些因素必须被驱逐，以便现代国家能够存在。对于一个教派来说，生活正是其特定的哲学真理所需要的，也是其得到解释的方式–对世俗事物和事件的某种处置，一种不忽视重要事物的方式。社会（及其相关物：经济）的出现与自由主义对公共和私人的重新定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重叠。教派的集体主义本身就是对自由社会这一说法的一种威胁。这是由于它是一种分裂性的组织形式。现代国家创始人的噩梦就在这里：一部分集体脱离了整体，从而破坏了社会团结的理念。社会无法处理的两件事。1）一种思想可能被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可能对一个人的存在产生影响，即她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或者她的生活方式，以及 2）这种体现不仅可以传递给他人，而且可以分享、交流。任何超出控制范围的集体经验都会被平庸地斥为所谓的教派。

商品的普遍性已经无处不在。这种普遍性是切断目的与手段的最有效工具，将日常生活降低为我们只需要管理的生活空间。日常生活是我们应该想要回归的；接受一种必要的和普遍的中和。它是对一种未被推迟的快乐的可能性的不断增长的放弃。正如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的，它是我们所有可能的罪行的平均值。

罕见的是那些能够逃脱等待他们的深渊的集体：将真实的东西混入极端的平淡，社区是平均强度的缩影，缓慢的解体笨拙地充满了一堆平庸和虚假的复杂的戏谑。

中和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每个人都知道中和的中心，在那里要求没有任何情绪突出，每个人都必须控制自己，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中心：企业（现在什么不是企业?）、夜总会、保龄球馆和高尔夫球场、博物馆等等。既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地方是怎么回事，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为什么–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可以如此受欢迎。为什么总是希望，最重要的是，不发生任何可能激起太深的骚动？是出于习惯？因为绝望？因为愤世嫉俗？或者其他原因：因为你可以感受到身处某地而不在那里，身处那里而基本上在其他地方的喜悦；因为我们的本体将被保存到甚至不必存在的地步。

这些都是所谓的伦理问题，当然必须提出，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我们在政治的核心中发现的问题：如何应对情感的中和以及决定性思想的潜在影响？还有：现代社会如何与这些中和相配合，或者说，如何使它们成为其持续运作的重要齿轮？帝国的物质效力与我们放弃的倾向有什么关系，无论我们的集体经历如何?

对这些中和的接受当然可以与伟大的创造性努力携手并进。你可以实验到疯狂的地步，条件是你是一个单一的创造者，并且你在公众面前产生这种单一性的证明（你的作品）。你仍然可以知道什么是激荡，但条件是你独自体验它们，而且你仅限于间接地传递它们。你将因此被承认为艺术家或思想家，而且，如果你参与政治活动，你将能够随心所欲地把瓶子扔进大海，带着一个看得更远并警告过别人的人的清白的良心。

像许多人一样，我们经历过，卡在内部的情绪会变得很糟糕：它们甚至会变成症状。我们在自己身上观察到的僵化，来自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

有义务设置的隔断，以确定自己的界限，并将不应该爆发的东西控制在自己的内部。当由于某种原因，这些隔断碰巧出现裂缝和破损时，就会出现令人不快的事情，甚至可能出现恐惧–但这是一种能够使我们摆脱恐惧的恐惧。对我们的个人限制和文明所划定的边界提出质疑，可以成为一种救命稻草。任何真正的社区的存在都需要某种生理上的危险：当情感和思想不再归属于任何一个人时，当恢复互动时，情感、想法、印象和情绪被不经意地交换。必须明白，社区本身并不是解决办法：它的消失才是问题所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

我们不认为人类是相互隔离的，也不认为人类是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生命隔离的；我们看到他们被我们已经学会否认的多种联系所约束。这种否认允许阻断情感交流，通过这种交流来体验这些多重联系。这种阻断反过来又是必要的，使我们习惯于最中性、最无生命力、最普通的感觉；这使我们渴望度假、午休或外出的夜晚，就像天赐良机一样–也就是说，同样是中性、普通、无生命力的东西，但却是自由选择的。特别是西方化的帝国秩序，是通过这种无聊来滋养的。

我们会被告知：通过倡导分享强烈情感的体验，你违背了生命体活着所需要的东西，即温和和平静–如今相当昂贵，就像任何稀缺商品一样。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观点与授权的休闲不相容，那么即使是冬季运动爱好者也可能承认，看到所有的滑雪场被烧毁，把那个环境还给旱獭也不是什么大损失。另一方面，我们并不反对任何生命体，作为一个生命体，自身所携带的温柔。” 可能是生活是一件温柔的事情”。任何一株草都比世界上所有的公民更了解这一点。

命题五

对于任何道德上的关注，对于任何对纯洁性的关注，我们都可以用集体制定的策略来代替。只有那些阻碍我们力量增长的东西才是坏的。从这个决议中可以看出，经济和政治不再有区别。我们不害怕结成帮派；只能嘲笑那些将我们斥为黑手党的人。

注释

我们被推销了这个谎言：对我们来说最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与普通人的区别。我们体验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个人的独特性都是以一种方式和强度来感受的，在这种方式和强度下，一个人把一些共同的东西带入了存在。

从根本上说，我们就是在这里开始的，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彼此。我们身上最奇特的东西需要被分享。

但我们注意到：不仅我们要分享的东西显然与主导秩序不相容，而且这个秩序还在努力追踪任何一种它没有规定规则的分享。例如，军营、医院、监狱、精神病院和养老院是大都市中唯一允许的集体生活形式。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被隔离在自己的私人隔间里。这就是他们无休止地返回的地方，无论他们感到多么强烈的排斥，无论他们在其他地方有多么大的遭遇。

我们已经知道这些生存条件，我们永远不会回到它们。它们太削弱我们了。使我们过于脆弱。使我们浪费掉。

隔离，在原始文化中，是对社区成员最严厉的判决。现在，它已经成为普遍的状况。灾难的其余部分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家有这种狭隘的想法，使得把街道留给警察显得很自然。如果不是

每个人之前都被赋予了私人空间的庇护，世界不可能变得如此不适合居住，社会性也不可能被如此控制–从商场到酒吧，从会议室到密室–。

在逃离残害我们的生存条件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棚屋；或者说，国际棚屋场景。在这个被占领的空间群中，尽管有许多限制，但有可能尝试不受控制的集体集会形式，我们已经知道了权力的增加。我们为基本的生存而组织起来：拾荒、偷窃、集体工作、共同进餐、分享技能、设备、爱的倾向–我们还发现了政治表达的形式：音乐会、示威、直接行动、破坏、传单。

然后，渐渐地，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变成了一个环境，从一个环境变成了一个场景。我们看到道德准则的制定取代了策略的制定。我们看到规范得到巩固，声誉得到发展，隐喻开始发挥作用；一切都变得如此可预测。集体冒险变成了一种阴郁的同居生活。一种敌意的宽容掌握了所有的关系。我们适应了。最后，被认为是反世界的东西只不过是主流世界的反映：在偷窃、斗殴、政治或激进的修正领域，同样的个人价值游戏–情感生活中同样的肮脏的自由主义，同样的访问和领土的争吵，同样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分裂，同样的身份偏执。对于最幸运的人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在其他地方，在某个仍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定期逃离当地的贫困。

我们并没有把这些弱点归咎于棚屋形式。我们既不否认也不抛弃它。我们说，只有在我们澄清我们所参与的分享的基础上，蹲坑对我们来说才会再次有意义。在棚屋里，像其他地方一样，集体创造一种策略是唯一的选择，而不是通过同化或贫民窟退缩到一个身份里。

关于策略的问题，我们已经从战败者的传统中吸取了所有的教训。我们记得劳工运动的开端。这些教训就在我们身边。

因为在最初阶段付诸实践的东西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生活，关系到我们今天要付诸实践的东西。将来被称为劳工运动的东西的建立，首先依赖

于犯罪行为的分享。秘密罢工资金、破坏行为、秘密社团、阶级暴力、在恢复个人头脑清醒时看到的第一批失业保险形式，这些都是在意识到其非法和对抗性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在美国，工人组织的形式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重叠是最明显的。在工业时代初期，美国无产者的力量来自于工人群体中破坏和报复资本的力量的发展，以及秘密团结的存在。工人永远被转变成罪犯，这就要求进行系统的控制：反对任何形式的自主组织的道德化。任何超越诚实工人理想的行为都被边缘化为黑帮主义。最终，一方面是黑手党，另一方面是工会，两者都是相互截断的产物。

在欧洲，将工人组织纳入国家管理机构–社会民主的基础–是以放弃最起码的滋扰能力为代价的。在这里，劳工运动的出现也是一个物质团结的问题，是对共产主义的迫切需求。人民之家” 是立即实现共产化的需要与实际执行革命进程的战略要求之间的最后一个避难所。随后，劳工运动的发展是合作化潮流与政治和工会形式之间的逐步分离，合作化潮流是与它的战略存在理由切断的经济利基，而政治和工会形式则是在选举主义或联合管理的领域工作。正是由于放弃了任何分离主义的目标，才诞生了这种荒谬的现象：左派。当工会成员谴责任何诉诸暴力的行为时，达到了高潮，他们向所有想听的人大声宣布，他们将与警察合作，控制暴乱者。

最近国家治安职能的增加只证明了这一点：西方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凝聚的能力。他们只能管理自己不可阻挡的衰败。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说，要防止任何重新凝聚，要粉碎任何突出的人。任何开小差的人。任何不守规矩的人。

但这是无能为力的。这些社会的内在毁灭状况允许越来越多的裂缝出现。不断翻新的表象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那里，世界形成了。棚屋、公社、集体村、贫民区，都试图从资本主义的荒芜中抽身。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或者因为没有建立联系和适当的团结而死于自闭。也因为没有把自己想象成全球内战中的全职党员。

但所有这些尝试性的重新整合与大众的欲望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不断推迟的退出欲望。要离开。

十年来，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有十万人在英国消失了。他们上了一辆卡车，买了一张票，扔了酸，或者转入地下。他们失去了归属感。他们离开了。

我们希望，在我们脱离关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重新加入，有一个方向可以选择，有一条道路可以遵循。

许多离开的人迷路了。而且永远不会到达。

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建立并维持一系列的逃亡中心，分离的极点，集结点。为逃亡者。为那些离开的人。一系列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一个走向深渊的文明的影响中逃离。

这是一个给我们自己提供手段的问题，找到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如果单独解决，会使我们陷入沮丧。如何消除削弱我们的依赖性？如何组织我们自己，使我们不再需要工作？如何在不回归自然的情况下超越大都市的毒害而定居？如何关闭核电站？如何在朋友发疯时不被迫求助于精神病学的粉碎；或在她生病时求助于机械主义医学的粗糙疗法？如何在没有相互压制的情况下共同生活？如何接受战友的死亡？如何毁掉帝国？

我们知道自己的弱点：我们在和平的社会中出生和成长，被解散。我们没有机会获得激烈的集体对抗时刻所能提供的力量。也没有与之相关的知识。我们有一个政治教育需要共同发展。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教育。

为此，我们需要地点。在那里我们可以组织起来，在那里我们可以分享和发展所需的技术。在那里我们可以学习处理所有可能证明是必要的事

情。在那里我们可以进行合作。如果它没有放弃任何政治观点，包豪斯的实验，以及它所包含的所有物质性和严谨性，将唤起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专门用于传播知识和经验的空间-时间。黑豹组织为自己配备了这样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军事能力，他们每天分发一万份免费午餐，以及他们的自主新闻。不久之后，他们形成了对权力的威胁，以至于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派人去屠杀他们。

凡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力量的人都知道，他们成为全球敌对行动过程中的游击队员。诉诸或放弃所谓的暴力的问题在这样的游击队员身上并不存在。而和平主义与防暴警察和记者队伍一起，作为一种补充武器出现在帝国的服务中。与我们有关的考虑是强加给我们的不对称冲突的条件；我们必须考虑适合我们每一种做法的出现和消失的模式。示威、不戴面具的行动、愤怒的抗议：这些都是不适合与当前的统治制度作斗争的形式。它们甚至强化了它，为控制体系提供了最新的信息。无论如何，鉴于当代主体性的软弱甚至延伸到我们的领导人（但也是从我们成功地埋葬了最不重要的公民的一种含情脉脉的悲怆的角度来看），攻击物质设备而不是赋予它们面子的人，似乎是明智的。这是出于纯粹的战略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转向所有游击队特有的行动形式：匿名破坏、无人认领的行动、求助于容易复制的技术、有针对性的反击。

这不是一个关于我们为自己提供生活和战斗手段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我们为自己提供的手段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手段的战术问题。

” 资本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表现是悲伤，” 一位朋友曾说。

现在的问题是要为共同接受快乐创造物质条件。

命题六

一方面，我们要过共产主义的生活；另一方面，要传播无治主义。

注释

我们正生活在最极端的分离时代。大都会令人沮丧的常态，其孤独的人群，表达了一个由原子组成的社会的不可能的乌托邦。

最极端的分离揭示了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意义。

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或经济体系。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共产主义对苏联不屑一顾。而我们无法解释过去五十年来每十年都有人假装重新发现斯大林的罪行，喊着” 看看什么是共产主义！” 如果他们没有感觉到现实中一切都把我们推到那里。

反对共产主义的唯一理由是我们不需要它。当然，直到最近，在这里和那里，尽管它们是有限的，但仍然有一些东西、语言、思想和地方是共享的，而且经久不衰；至少有足够的东西不会消逝。有一些世界，而且它们是有人居住的。拒绝思考，拒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有实际的论据。这些都已经被扫除了。80 年代，尽管它们经久不衰，但仍然是这场最终清洗的创伤性参考点。从那时起，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变得痛苦。到了使任何麻醉、任何隔离都变得更可取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其胜利的过度，存在主义的自由主义正把我们推向共产主义的边缘。

共产主义问题是关于弄清我们与世界、与其他生命、与我们自己的关系。它涉及不同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阐述，涉及它们之间的沟通。不是关于全球空间的统一，而是关于可感知事物的体制，也就是说，世界的多

元性。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并不是所有冲突的消亡；它并不描述在一切都说过和做过之后社会的最终状况。因为也正是通过冲突，各个世界才相互影响。”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只是与人本身无关的差异，不被保留的恰恰是真正的差异，是质量的差异。共产主义者并不想创造一个集体的灵魂。他想创造一个消除了虚假差异的社会。而这些虚假的差异被消除后，他们所有的可能性都向真正的差异开放。” 一位老朋友这样说。

很明显，正如他们所说，什么适合我，什么我需要，什么构成我的世界，这个问题已经沦为法律上强制执行的私有财产的虚构，即什么属于我，什么是我的。只要某样东西加入了我的使用范围，它就属于我–而不是凭借任何法律上的所有权。归根结底，私有财产除了保护它的力量外，没有其他现实。因此，共产主义的问题是，一方面，取消警察，另一方面，在那些相互生活的人之间，制定分享和使用的模式。这个问题每天都被用” 让我休息一下！” 和” 随便吧，老兄！” 来回避。共产主义当然不是给定的。它必须被考虑，它必须被制造。几乎所有反对它的人都会归结为一种疲惫的表达。” 但你永远不会成功…..。它不可能成功…人类就是这样…而且要过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 能量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疲惫不是一个论点。它是一种条件。

因此，共产主义是从分享的经验开始的。首先，从分享我们的需求开始。需求不是资本主义统治让我们习惯的东西。需求从来都不是指需要东西而不同时需要世界。我们的每一种需要都将我们与每一个经历过这种联系的人联系在一起，超越了一切羞耻。需求只是一种关系的名称，通过这种关系，一个特定的感知者赋予其世界中这样或那样的元素以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没有世界的人–例如大都市的主体性–除了异想天开之外一无

所有。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尽管它像其他东西一样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但却只传播了普遍的不满：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破坏世界。

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某种关注的纪律。

共产主义的实践，正如我们生活的那样，我们称之为党。当我们一起克服障碍或达到更高的分享水平时，我们说我们在” 建设党”。当然，目前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人正在其他地方建设党。这一呼吁是针对他们的。如果不组织起来，不把自己和别人绑在一起，不在危机中站队，不发动战争，目前的共产主义经验就无法生存。” 因为当我们在其中寻求庇护时，发放生命的绿洲就被消灭了。”

按照我们的理解，建立共产主义的过程只能采取共产化行为的集合形式，使这样那样的空间、这样那样的装置、这样那样的知识成为共有。也就是说，对与之相关的分享模式的阐述。叛乱本身只是一个加速器，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按照我们的意图，党不是一个组织–在那里，一切都因为透明而变得无足轻重，它也不是一个家庭–在那里，一切都因为不透明而充满了欺骗的味道。

党是一个地方、基础设施、公共方法的集合，以及在这些地方之间循环的梦想、身体、杂音、思想、欲望；对这些方法的使用，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分享。

党的概念回应了最低限度的形式化的必要性，它使我们可以接触到，同时也允许我们保持隐身。它属于我们向自己解释的共产主义方式，以制定我们共享的基础。这样一来，最近到来的人至少是与最年长的人平等的。

仔细看看，党可能不过如此：作为一种力量的直觉的形成。一个世界群岛的部署。在帝国之下，如果没有农场、学校、武器、药品、集体宿舍、编辑台、印刷厂、运货车和在大都市的桥头堡，那么政治力量会是什么?

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要为资本工作–当然，除了通常的渗透工作之外，似乎越来越荒唐了。

党的攻击力来自于它也是一种生产的力量；然而，从本质上讲，这些关系只是附带的生产关系。

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将所有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从企业到家庭，消费本身作为一般生产，即社会生产中的另一个情节出现。

推翻资本主义将来自那些能够为其他类型的关系创造条件的人。

因此，我们谈论的共产主义与历史上被称为” 共产主义” 的东西完全相反，后者大多不过是社会主义，是一种垄断性的国家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不是通过扩大新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废除这些关系来实现的。

在我们的环境中或在我们自己之间没有生产关系意味着永远不要让对结果的追求变得比对过程的关注更重要，让所有的价值惯例破产，并注意我们不要把感情和合作脱节。

对世界的关注，对它们可感知的配置的关注，正是使类似生产关系的孤立变得不可能的东西。在我们开放的地方，在我们分享的手段周围，正是我们所寻求的这种恩惠，我们所体验的。为了给这种体验命名，我们经常听到一切是自由的。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可能忘记这种自由的实践在组织方面意味着什么，而且在短期内意味着政治对立。

因此，党的建设，在其最明显的方面，包括分享或公有化我们所掌握的东西。共用一个地方意味着：解放它的使用，并在这种解放的基础上，试验精致的、强化的和复杂的关系。如果私有财产在本质上是剥夺任何人对所占有的东西的使用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公有化只能意味着剥夺帝国的代理人的这种占有。

我们从每一个方面都反对必须在进攻性和建设性、消极性和积极性、生命和生存、战争和日常之间做出选择的敲诈。我们不会对它作出反应。我们非常明白这种肢解性的选择是如何分裂和再分裂所有现有的集体的。对于一种被部署的力量来说，不可能说消灭一种伤害它的装置是建设性的还是进攻性的，如果实现饮食或医疗自主权构成战争或减法的行为。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在暴乱中，治疗我们的同志的能力大大增强了我们的破坏能力。谁能说武装我们自己不会是一个集体的物质构成的一部分？当我们就共同的战略达成一致时，在进攻性和建设性之间没有选择；显然，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什么会增加我们的力量，什么会损害它，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而当缺乏证据的时候，就会有讨论，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有赌博。

总的来说，我们看不出除了一种力量，一种能够在资本主义完全失调的情况下生存的现实，还有什么能够真正攻击它，直到它失调的那一刻。

当那个时刻到来时，这将是一个将普遍的社会崩溃实际转化为我们的优势的问题，将崩溃（如阿根廷或苏联）转化为革命形势。那些假装将物质自主权与帝国机器的破坏分开的人表明，他们两者都不想要。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分享实验是 1868 年至 1939 年的西班牙无治主义运动现象，这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

命题七

共产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迄今为止，我们所称的历史不过是人类为避免它而发明的一套迂回的手段。一个世纪以来，这段历史只剩下各种灾难的累积，这一事实表明，共产主义问题已经不能再推迟了。反过来说，正是这种推迟，我们也不能推迟。

注释

” 但你实际上想要什么？你的建议是什么？” 这种问题可能看起来很无辜。但不幸的是，这些并不是问题。它们是操作问题。

提及每一个向陌生的” 你” 表达自己的” 我们”，意味着首先要避免这样的威胁：这个” 我们” 以某种方式命名我，这个” 我们” 通过我。从而使那个仅仅写下特定术语–不能归于任何人–的人成为其主人。因此，在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分离的有条不紊的组织中，术语被允许流通的条件是，它们可以证明有一个所有者，一个作者。没有这一点，它们就有可能进入公共领域，而只有那些由 Them 表达的东西才允许匿名传播。

然后是这种神秘化：在一个令我们不快的世界中，会有一些建议可以提出，会有一些替代品可以找到。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与有理智的人冷静地讨论，把自己从我们所处的状况中解脱出来。

但是，没有，除了局势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全球内战没有外部。我们已经无可救药地置身其中。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制定一个战略。分享对局势的分析，并在其中制定战略。这是唯一可能的革命的” 我们”：一个实际的” 我们”，公开的和分散的，任何人都按照同样的路线行动。

当我们在 2003 年 8 月写下这篇文章时，我们可以说，我们面临着过去二十年来资本的最大攻势。反恐和废除已不复存在的劳工运动的最后成

果，造成了民众步调一致的普遍情绪。社会管理者从未如此清楚地知道他们从哪些障碍中解放出来，他们掌握了哪些手段。例如，他们知道，目前（以及从现在开始）生活在大都市的地球上的中下层阶级已经被解除了武装，无法对其计划中的消灭进行丝毫的抵抗。正如他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他们所领导的反革命被刻在数百万吨的混凝土中，刻在许多新城镇的建筑中。从长远来看，资本的计划似乎是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出一个高度安全的区域网络，彼此之间不断联系，资本主义价值化的过程将以一种永久和无阻碍的方式涵盖所有的生活表现。这个由非领土化的公民组成的帝国舒适区，将形成一种警察的连续体，在那里，或多或少的控制水平将占上风，在政治上和生物统计学上。当他们推进安抚进程时，世界其他地方可以作为一个陪衬，同时作为一个巨大的外部文明而繁荣。几十年来在以色列进行的敌对飞地之间的强迫同居的野蛮实验，将成为未来社会管理的典范。我们不怀疑，在这一切中，资本的真正问题是按照它自己的形象从头开始重建社会。不管是什么形式，也不管代价有多大。

我们在阿根廷看到，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并不是一个太高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所有感到这三个运动的战术必要性的人结成联盟。

通过任何和一切手段，防止左派的重新组合。

从自然灾害到社会运动，推进共产化的进程，推进党的建设。

把分离的权利引入帝国机器的重要部门。

1. 左派周期性地被击溃。我们喜欢这样，但这还不够。我们希望它的溃败是决定性的。无法挽回的。愿可调和的反对派的幽灵不再出现，以蒙蔽那些知道自己与资本主义功能不相容的人的头脑。今天大家都承认（但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的是，左派是自由主义社会特有的中和机制的一

个组成部分。社会内爆越是被证明是真实的，左派就越是援引公民社会。警察越是肆无忌惮地行使他们的任意意志，左派就越是宣布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国家越是抛开其最后的司法手续，他们就越是成为顺从的公民。越是急于占有我们的生存手段，左派就越是劝说我们等待和乞求我们的主人的调解，如果不是保护。今天，面对公然站在社会战争舞台上的政府，是左派要求我们对权力说真话，写出我们的不满，形成要求，研究政治经济学。从 L é on Blum 到 Lula，左派一直是这样的：人类的政党，公民的政党，文明的政党。今天，这个计划与一个完全反革命的计划相吻合。那就是维持使我们瘫痪的幻想的组合。因此，左派的使命是阐述只有帝国才能承担的梦想。它代表了帝国现代化的理想主义的一面，是资本主义无法忍受的步伐的必要的蒸汽阀。它甚至被无耻地写在法国青年、教育和研究部的出版物上。”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公民的具体帮助，国家将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进行能够防止我们社会爆炸的工作”（《渴望行动：承诺指南》）。

打败左派，也就是保持社会不满情绪的渠道持续开放，在今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看到，在帝国结构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从旧的工人主义左派（虽然诞生于劳工运动，但却是劳工运动的掘墓人）过渡到新的全球文化左派，可以说，奈格里主义是其中最先进的一点。这个新的左派在最近被阉割的反全球化运动中还没有完全确立。他们拿出的新诱饵还没有生效，而旧的诱饵却早已不复存在。

我们的任务是在全球左翼表现出来的地方毁掉它，有条不紊地破坏它所有的形成时刻，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因此，我们在热那亚的成功不在于与警察的精彩对抗，也不在于对国家和资本机构造成的损害，而在于将黑色集团特有的对抗做法推广到示威的各个部分，破坏了 Tute Bianche

的预期胜利。即便如此，我们的失败在于不知道如何扩展我们的立场，使街头的胜利不再成为和平主义者从那时起系统地提出的幽灵。

这个全球左派退缩到社会论坛中–这种退缩是由于它在街头被打败了–是我们现在必须攻击的。

2.2. 使一切运作的压力逐年增加。随着社会网络化的发展，正常的情况变得更加紧迫。因此，危机和故障的情况以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方式倍增。从帝国的角度来看，停电、飓风或社会运动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干扰。它们必须被管理。就目前而言，由于我们的弱点，这些中断的情况就像帝国突然出现的时刻，在世界的物质性中占有一席之地，试验新的管理程序。恰恰是在那里，它把自己更牢固地附着在它声称要帮助的人群上。帝国总是致力于成为使局势恢复正常的代理人。反之，我们的任务是使例外的情况变得可以居住。我们要真正成功地阻挡企业社会，只有在这种阻挡充满了恢复正常以外的欲望的条件下。

在罢工或自然灾害期间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的依赖性的有组织的稳定性被打断了。需求的存在（共产主义的本质）–那在本质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并在本质上将我们分开的东西–在它们的每一个过程中都被暴露出来。通常覆盖它的羞耻感的毯子被撕开了。对遭遇的接受，对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其他关系的试验，正如它在这些时刻所表现的那样，足以扫除对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的任何怀疑。对共产主义的需要也是如此。现在需要的是我们自我组织的能力，我们的能力（通过在我们需求的基础上立即组织起来），延长、扩大并最终使例外情况有效，以对抗伊美尔权力所依赖的恐怖。这在社会运动中尤其引人注目。甚至社会运动这一表述也似乎暗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正在走向什么，而不是此时此地正在发生什么。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社会运动中，都有一种避免抓住时间的偏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永远无法聚在一起；相反，他们

似乎在互相驱赶。因此，他们的社会性的特殊结构，如此不稳定，任何承诺似乎都可以撤销。这也是他们不变的戏剧性弧线：由于媒体强调的一些流行的共鸣而迅速上升；接下来，由于这种仓促的聚集，缓慢但不可避免的侵蚀；最后，干涸的运动，最后一小撮死忠从这个或那个工会拿到卡片，找到这个或那个协会，从而希望找到他们承诺的组织连续性。但我们并不是在寻找这样的连续性：有可以聚会的场所，有可以打印传单的复印机。我们所寻求的连续性是让我们在奋斗了几个月之后，不至于回到工作岗位，不至于像以前一样重新开始工作，继续进行伤害。而这只能在运动中建立。这是一个立即落实物质共享的问题，即建设一个真正的革命战争机器，建设党。

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需要来组织我们自己–设法依次回答吃饭、睡觉、思考、爱、创造形式、协调我们的力量等集体问题–并将这一切视为反帝国战争中的一个机会。

只有这样，通过居住在它的程序的干扰中，我们才能够对抗经济自由主义，而经济自由主义只是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的严格结果，是它的逻辑应用，它被到处接受和实践。每个人都把它当作最基本的权利，包括那些想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人。这就是党的建设方式；作为帝国遇到的每一种例外情况所留下的可居住地的痕迹。那么，我们不会不注意到，主体性和革命集体是如何变得不那么飘忽不定的，因为它们显示了它们的真正构成。

3. 帝国如今是通过两个垄断的构成来体现的：一方面是对世界的所谓客观描述和实验技术的科学垄断，另一方面是对自我技术的宗教垄断，对主体性阐述自身的方法的垄断–精神分析的实践与此直接相关。一方面，与世界的关系被净化了，没有任何与自我的关系–与作为世界碎片的自我的关系；另一方面，与自我的关系被净化了，没有任何与世界的关系–与

世界的关系，因为它通过我。因此，科学和宗教在相互撕扯的过程中，恰好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帝国可以完全自由地活动。

当然，这些垄断是根据帝国的区域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的。在所谓的发达地区，宗教话语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科学构成了一种真理的话语，它被赋予了制定集体存在的权力。因此，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开始提示分离。

促使从科学中分离并不意味着扑向它们，就像扑向要征服或夷平的堡垒一样，而是增加贯穿它们的断层线的突出性，与那些强调这些线的人站在一起，他们试图揭开这些线。就像裂缝不断困扰着社会的虚假密度一样，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形成了一个充满策略的战场。长期以来，科学界一直设法给自己塑造一个团结的大家庭的形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尊重礼貌的规则。这甚至是附属于科学界存在的主要政治行动：掩盖内部分裂，并从这种平滑的形象中施加一种无与伦比的恐怖影响。对外的恐怖：剥夺任何和所有不被承认为科学的讨论的真理地位。对内的恐怖：礼貌但激烈地取消潜在的异端邪说的资格。” 尊敬的同事…..”

每一门科学都会实施一系列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关于现实的构建的那么多决定。今天，这一点已被广泛承认。被否认的是这些决定中的每一个的伦理意义，它们以何种方式涉及某种生命形式，某种感知世界的方式(例如，将各种生命的进化体验为基因程序的解开，或将快乐体验为血清素的问题)。

以这种方式考虑，科学语言游戏似乎不是为了在使用它们的人之间建立沟通，而是为了排除那些忽视它们的人。科学活动所处的密不透风的设备–实验室、研讨会等–本身就意味着实验和它们可能描述的世界之间的

分离。仅仅描述所谓的核心研究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军事-商业利益相联系，以及这些利益如何相互界定研究的内容和参数是不够的。就科学参与帝国安抚的程度而言，它首先是只进行那些实验，只测试那些与维持现行秩序相适应的假设。我们破坏帝国秩序的能力是以开放对立的实验空间为条件的。为了使这些实验产生其相关的世界，我们需要这种被清理的空间，正如这些世界的多元性对于科学实践的窒息的对抗性的表达是需要的。

重要的是，旧的机械主义和巴斯德医学的从业者要重新加入那些可能被称为传统医学的从业者–所有新时代的混乱都要抛开。对研究的重视需要停止与对实验室完整性的司法辩护相混淆。非生产主义的农业实践需要发展到超越有机标签。那些忍受着公共教育中令人难以忍受的矛盾的人，在捍卫良好的公民身份和分散的企业家精神的车间之间，需要变得越来越多。文化不应该再以单个发明家的贡献为荣。

联盟在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

为了变得有效，打破资本主义循环的观点要求分离的数量增加，并使之巩固。

我们将被告知：你们陷入了一种选择，它将以一种方式谴责你们：要么你们设法对帝国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将很快被消灭；要么你们无法构成这种威胁，你们将再次毁灭自己。

现在只剩下赌另一个结果的存在，一个薄薄的山脊，刚好够我们行走，刚好够所有能听到的人在上面行走和生活。

隐形委员会

呼吁

a-lib.net